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FOREIGN HISTORIOGRAPHY ON MODERN CHINA
25

^ 2001
4.25

90371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二十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吉 边
责任校对：丁 毅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劳 定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二十五辑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04153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新魏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2插页 280千字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004-1518-4/K·234 定价：11.00元

目 录

· 专题论文 ·

- 改革、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1900—1908年中国的
禁烟运动与英美的影响……………托马斯·D. 莱因斯 (1)
罗检秋译
- 地方的军事力量与权贵的形成：贵州兴义的刘氏家族
……………爱德华·麦科德 (45)
周秋光译
- 20世纪初中国的内战与军阀主义的出现…爱德华·麦科德 (77)
周秋光译
- 康有为与吴佩孚……………竹内弘行 (99)
翁敏华译 马洪林校
- 英国对华政策与共产党人(1942—1946)：薛穆大使
的作用……………李时安 (118)
刘 薇译 杜继东校
- 从《昭和天皇独白录》看裕仁天皇……………井上 清 (133)
吕永和节译
- 中国农村市场的早期现代化……………施坚雅 (155)
史建云译 虞和平校

· 书刊评介 ·

- 《民国时期的土匪》国外评论述评……………徐有威 (191)

· 学术动态 ·

- 战后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势·····小島晋治 (207)
李冬梅译 汪 焯校
- 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並木頼寿 (226)
黄东兰译
- 西方对中国革命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范力沛 (255)
陶文钊 樊书华整理
- 1984年以来关于731部队的研究状况·····松村高夫 (263)
李冬梅译 齐福霖校
- 外国在华机关公团名汇(十)·····黄光域辑 (282)
-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目录(第1—24辑)····· (330)

改革、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1900—1908年 中国的禁烟运动与英美的影响

托马斯·D.莱因斯

改革背景

禁烟运动可能是晚清改革中最令人震惊的事件。这场运动始于1906年底，到1908年底已见成效：国内鸦片的种植和消费量大幅度减少，并且获得英国逐渐停止进口鸦片的正式担保。考虑到其发生背景时，这些惊人成就就显得更加伟大。

1906年9月禁烟法令颁布之前，中国对鸦片问题显然采取姑息态度，只是尽量减少它带来的麻烦。允许外国人向华输入鸦片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排除了北京禁毒的一切机会。就在10年前，一个英国皇家委员会批准继续这种贸易，这使得外国人主动放弃鸦片贸易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了。同时，中国的鸦片生产正方兴未艾。

1901至1906年，满清政府通过与几个西方国家议定条约，进一步限制鸦片和吗啡的进口。这使得毒品贸易问题成为热点。然而，这些限制只是象征性的，并不意味着外国对于鸦片贸易采取新的态度。如果清政府对鸦片贸易不加限制，它可以和地方督抚及各类要员一样从国内外鸦片生产的巨额税收中得到好处。确实，直到1906年，清政府不禁注意到，相对于暗淡的、赤字累累的财政预算而言，鸦片成为其少有的重要财源之一。

然而，当禁毒的时机成熟时，清政府甘愿放弃鸦片带来的经

济利益。1905年，清廷得知英国正在考虑终止其日趋衰落的对华鸦片贸易，于是很快行动起来排除一切可能给禁烟造成障碍的因素。实际上，由于印度鸦片从中国市场退出，土烟很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英国要求中国对其根除鸦片的切实努力作出某些担保。为了减少英国人的担心，慈禧太后颁布了后世著名的法令，要求在10年之内禁绝鸦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一个多世纪的事情加以反对最终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欧、美的禁烟倡导者动员舆论工具，宣传鸦片贸易是不人道的，其后果是有害的、倒退的。他们的主张在伦敦、华盛顿等决策中心博得了同情。此外，印度鸦片贸易中经济利润的减少加快了我国实行禁烟改革的步伐，当局以此炫耀它所允诺的“进步”。更明确地说，这场运动为北京控制国内鸦片税收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在此之前，那些地方税收官吏从中大捞油水。继续进一步控制土烟生产是减少洋烟进口的保证。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1907年，英国同意根据我国禁绝国内鸦片的相应情况至1917年逐步停止鸦片贸易。

改革的依据(1900—1906)

直到清王朝的风烛之年，协调一致且组织完善地解决鸦片问题的尝试才在中国社会出现。^①这一举措也许是从18世纪晚期鸦片开始成为严重问题直到1949年共产党当政期间所进行的唯一有

^① 中国官员成功地与美国议定了一个条约，从而禁止这个主要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入鸦片。1880年11月17日，在北京签订了中美商务关系和司法规程条约。其中第2款写有：中美政府一致同意和保证将不允许中国臣民从美国任何地方输入鸦片，也不允许美国公民向中国任何通商口岸输出鸦片。更重要的是，美国同意中美两国国民对现存条约中最惠国条款的利益的要求均不得违反这一条款。见查尔斯·I. 贝文斯(Charles I. Berins)编《美国的条约及其它国际协议(1776—1949)》(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76—1949)(6卷本，华盛顿特区：政府出版局，1971年，第6卷，第689页。)它规定，在美

效运动。1906年9月20日，慈禧太后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①两个月之后的11月21日公布了禁烟章程。^②

其后10年，禁止鸦片的改革运动被描绘成“人类历史上铲除一大公害的最大且最有力的尝试”。^③法令着重强调，鸦片是一大社会祸害：“(鸦片)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进取图强，亟应申敬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沉痾而蹈康和。”^④

鸦片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也使之成为受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攻击的一个适当靶子。确实，清朝发动禁烟运动不仅为了恢复国内元气，而且要达到逐渐缩减和最终停止向华输入鸦片的目的是。^⑤作

国法律中被定罪的鸦片贩子将被认为犯有轻罪。1903年10月8日，中美通商条约第16款对1880年的鸦片条款作了补充，规定两国停止吗啡贸易。见马克谟(John V. A. MacMurray)编《列国对华约章汇编(1894—1919)》(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 (两卷本，纽约：霍华德·费尔泰格公司，1973年)上卷，第431页。

① 法令全文见英国外交部藏《中国(第1号，1908年)·关于中国鸦片问题的通信》(China, No. 1[1908],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Opium Question in China) (伦敦，1908年)第2—3页。又见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第1259页(台北，1963年，两卷本)和《大清历朝实录》(光绪朝) (台北，1964年)第8卷，第5155页。J. C. S. 霍尔(Hall)认为，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在控制鸦片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见他的《1927—1937年的滇系》(The Yunnan Provincial Faction, 1927—1937) (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99—142页。

②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中朝制度考》(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第3次修订版(纽约：罗塞尔和罗塞尔公司，1908年复制本，1967年)附录F;《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第1264页;子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231—233页(上海，1934年)。

③ 芮玛丽(Mary C. Wright):《中国的革命：第一阶段(1900—1913)》(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

④ 《中国(第1号，1908年)》，第2页;《大清历朝实录》(光绪朝)第8卷，第5155页。

⑤ 马士:《中朝制度考》，第491页。

为晚清收回利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禁烟运动必然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在民族之林中争得平等地位的斗争联系起来。只要不平等条约存在，洋烟就将继续合法地进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禁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力争恢复其禁止洋烟进口的权利。^①

禁烟的决定是在一片怀疑声中作出的。就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要想取得西方对其摆脱鸦片的同情似乎是不可能的。^②在国内，禁烟运动开始之前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经得起放弃鸦片税收？例如，1887至1906年间，中国每年从鸦片贸易中至少征收五百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占国家财政预算的5%—7%）来自征收洋烟的关税和厘金（内地过境费用）。^③第二，这样一场运动能否得到政府官僚和地方绅士的支持？他们征收国内鸦片厘金并占有其中很大部分，吸食与运售鸦片，甚至三者兼而有之。

北京缓慢而又谨慎地争取西方帮助，从而限制中国的洋烟销售。早在1900年9月，中国驻法公使就要求法国采取步骤堵塞从印度支那进入云南的鸦片通道，制止经由上海法租界将鸦片、吗啡和烟具走私输入中国境内。^④而且在1902年9月5日与英国签订的商务条约中，英国同意“允禁吗啡任便贩卖来华”。^⑤1903年

① 马士：《中朝制度考》，第491页。

② 谭春霖(Chester C. Tan)：《义和团大灾难》(The Boxer Catastrophe)第215—236页(纽约：诺顿公司，1967年)。

③ 《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中国上海(1909年2月1日至26日)》(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Shanghai, China, February 1 to February 26, 1909)(以下简称“报告”)(两卷本，上海：字林西报馆，1909年：第53页)。

④ 英国外交部：《中国(第2号，1909年)·陛下驻华公使转呈的里奇先生关于中国鸦片问题的总报告》(China, No. 2[1908], Despatch From His Majesty's Minister in China Forwarding a General Report By Mr. Læsch Respecting the Opium Question in China)(伦敦，1908年)第5—6页。

⑤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1168页；《美国国际法日志》(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 (1909年)附录，第263—264页；《中国禁烟法令变

10月8日，美国同意了类似条款。^①次年，中国与德国订立的协定以及1905年的协定，试图控制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②1904年11月的中葡条约几乎包含同样的条款，旨在停止澳门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走私。葡萄牙也允诺对华输出吗啡仅限于医用。^③虽然这些条约意味着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它们仅仅触及鸦片问题的细枝末节。^④

与此同时，朝廷反对鸦片的零散行动并不意味着对土烟或洋烟的普遍反感。^⑤更有甚者，义和团运动后的改革被斥为在很大程度上靠鸦片收入提供资金。张之洞是官方改革的主要代言人。他曾经反对鸦片，但当他触及中国的近代化问题时，就改变了语气。他在《劝学篇》中说鸦片之害足以毁人才能，削弱士气，浪费金钱。至少在1898年，他把中国吸食鸦片者归结于愚昧无知，认

迁史》，第137页；马克谟：《列国对华约章汇编》（上卷）第351页。但该条约规定，只有列强都同意输入中国的吗啡仅限于医用时，英国才开始实行。

①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1187页；《美国国际法日志》，第255页；《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137—138页；马克谟：《约章汇编》（上卷）第431页。不管其它列强如何行动，美国同意输入中国的吗啡仅限于医用。

② 《美国国际法日志》，第260—261页。

③ 同上书，第267—268页；《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1215页。

④ 《报告》（下册）第66页。不幸的是出现了吗啡走私，见《报告》（下册）第67—70页。

⑤ 路康乐（Edward Rhoads）：《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1913年的广东》（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95页。于恩德不同意这一点，认为政府官员、报刊、学生界和一般人士都把鸦片看作危害社会、消耗国力的根源。这样，张之洞的《劝学篇》被当作政府内部禁烟主张的证据。但于恩德没有注意到张之洞也主张用鸦片收入来举办洋务（见《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115—116、242—243页），而且留下了19世纪晚期民众和官吏对禁烟持冷淡态度的材料。例如，1870年代中期张贴在广州街头的一首诗，见《中国评论》（China Review）4.2（1875—1876）第137页；又见1890年代初一份关于严惩种植、销售和吸食鸦片的传单，见《养和堂遗集》，载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一）第583—586页（6卷本，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关于抵制与主张禁烟的联系，见《复苏的中国精神》（The Rising Spirit of China），载《展望》（Outlook），1905年10月7日，第315—316页。

为发展教育是禁烟的妙方。^①然而3年之后，张之洞却在给皇帝的建议中说，鸦片税收可以增加国家收入，以便兴办洋务。他以日本在台湾的做法为例，认为政府应买下全部洋烟，然后转售给私人商号，使之在全国销售。张之洞写道：估计国家每年可以增加一千万两白银……^②

象张之洞这种对待鸦片的矛盾心态并非独一无二。许多上层官僚和有影响的人士长时间以来一方面痛恨鸦片，一方面又承认鸦片贸易带来税收利益。例如，1875年，曾国藩主张推行禁种鸦片的措施，并在数年后提出没收种植罂粟的土地。但是，到80年代末，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向皇帝建议以鸦片关税和厘金充当在上海举办洋务的资金。^③

李鸿章很早就主张把鸦片税收用于特殊项目，并且一贯坚持这样做。如1862年，他主张鸦片税收用于偿还贷款；1874年——用于直隶的海防；1884年——用于在北京举办警政；1888年——用于偿付外国贷款的利息；1890年——用来购买舰队所需要的煤和行政开支；1891年——用于支付轮船的费用。^④但李鸿章偶尔又似乎在攻击鸦片，提出增加厘金以抑制鸦片消费。在1880年的中美条约中，正是李鸿章帮助制定了限制鸦片的条款。次年，他又

① 邓嗣禹、费正清(Ssu-yu Teng, John K. Fairbank)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通论》(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纽约：雅典娜公司，1954年)第169—170页；又见梅里贝思·E. 卡梅伦(Meribeth E. Cameron)：《张之洞的仕宦生涯》(The Public Career of Chang Chih-tung)，载《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7号，第192页，1938年9月。

②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204页。

③ 张仲礼 斯坦利·斯佩克特(Stanley Spector)：《19世纪中国七位要员编年史指南》(Guide to the Memorials of Seven Leading Official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213、215、231页。

④ 同上书，第245、277、285、311、327、329、334、336页；《中国时报》(Chinese Times)(天津)，1887年9月3日，第724页；1887年12月3日，第947页。

派一位非正式使节去印度讨论鸦片问题。^①

李鸿章对鸦片收入的依赖或许给其重税禁烟建议的诚意投下了重重阴影。但那些设想以禁烟为目标的人又如何呢？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左宗棠反对鸦片，反对贩运鸦片，抨击对种植、吸食鸦片不加限制的官员。他的禁烟办法还包括增加洋烟土烟的税收。^②王韬本人吸食鸦片，他建议政府支持增加国内鸦片种植，从而把消耗中国财富的洋烟挤出去。^③人们一定感到疑惑：在这些人的头脑中，鸦片改革与金钱考虑到底哪一个更为重要，更能成为鸦片政策据以制定的基础？

由于可借鉴的国内禁烟主张刚刚萌芽，加之与西方刚刚订立的条约中对来华鸦片、吗啡的控制十分有限，因此，清廷禁绝鸦片的决定显然是1905年9月以后才作出的，而且以唐绍仪的报告和

① 张仲礼、斯坦利·斯佩克特：《19世纪中国七位要员编年史指南》，第302页；又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三卷本，台北：成文书局，无日期)第2卷，第376页。1880年代初期，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说：“我不能不怀疑中国当局，尤其是李鸿章的禁烟诚意。”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83年，(华盛顿特区：政府出版局，1884年)第127页。但李鸿章在致英国禁烟会会长的一封长信中重弹引起大多数西方人猜疑的中国鸦片问题的老调：“鸦片是英国和中国人从未取得共识的讨论主题。中国从道德观点看待整个鸦片问题，而英国则从财政上来看。英国依赖印度的财源，而中国则出于对人民的生活和昌盛的考虑。中国的行动准则是以普遍的重税削减鸦片，而英国的明显目的则是使鸦片变得更加便宜，从而刺激和增加中国的鸦片消费。”不管中国的“行动准则”是什么，即使是强烈反对中印鸦片贸易的人也不会否认其中中国的实际财政收益。同上书，第128页。标着重号的是李鸿章语。

② 张仲礼、斯坦利·斯佩克特：《19世纪中国七位要员编年史指南》，第155、166、173—174页。

③ 柯文(Paul A. Cohen)：《在传统与近代之间：王韬与晚清中国的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66、83、203页。不少人拥护王韬解决鸦片问题的办法。因此，当清政府谈论鸦片改革时，英国对中国人的意图总是十分谨慎。见俞赞：《通商论》，载杨松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北京，1954年)第282—283、285页。

请求为依据。1905年，唐绍仪在印度调查荣赫鹏西藏探险队的影响时，了解到英国可能同意停止其对华鸦片贸易。1905年9月16日，唐绍仪从加尔各答回国，向慈禧报告了英国对半个世纪以来的旧鸦片政策的惊人改变。但他同时指出，英国这个政策的转变将以中国停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的证据为前提。^①清王朝不可能拒绝这个条件。确实，一场成功的禁烟运动可能带来的利益大于一切潜在的危险。

鸦片改革的国外推动作用

英国愿意讨论对华鸦片贸易的前途既不是出于一种冲动行为，也不是基于一个公共关系计划。中国存在实行包括禁烟在内的广泛的改革计划的机会可能是由国内、国际(包括英、美)的进步力量创造的。几十年来，道德上的国际主义一直在提出并证明：全球合作能使理想的目标结出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传教士和各种进步人士一直在使西方世界认识中国鸦片泛滥的后果在很大

^①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1238页。有关唐在早期中英鸦片谈判中的作用，可见唐绍仪的《在英国禁烟委员会上的演说》(1909年2月12日，伦敦)，载《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第26号(1909年4月)，演说词在第38至39页。又见《中国(第1号，1908年)》第1—2页和英国外交部的《有关西藏的进一步报道(第3号)》(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ibet, No III) (1905年，伦敦)第67、82页。玛格丽特·利姆(Margaret Lim)认为，唐绍仪声称印度财政部长(爱德华·贝克爵士(Sir Edward Baker))提出印度可以放弃鸦片收入时，他过高地估计了英国的形势。见她的《英国与印中鸦片贸易的终结(1905—1913)》(Britain an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India—China Opium Trade, 1905—1913) (未刊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69年)第69—79、107页。在华的重要传教士杜步西(Hampden C. DuBose)认为，中国的禁烟法令可以说是1906年8月21日近1400位传教士向皇帝提交请愿书的复印副本。见《字林星期周刊》，1907年8月30日，第499—501页。也可查阅谢立山(Sir Alexander Hosie)的《鸦片问题探索：中国主要产烟省份旅行记》(On the Trail of the Opium Poppy: A Narrative of Travel in the Chief Opium Producing Provinces China) (两卷本，伦敦：乔治·非力浦公司，1914年)(下卷)第191—192页。

程度上是由西方贩运者造成的。^①至1905年,美国政府发布了“美国菲律宾报告”。该报告以图解方式描绘了亚洲肮脏的鸦片形势。^②但是,印度鸦片对华输入的减少可能是中国为中英条约开辟道路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③

从道义上反对鸦片 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呼声显著高涨,国际主义不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仍在逐渐发展。国际主义不仅提供了一个坚固而高尚的框架,而且还以充实的具体成果来激励参加反对鸦片运动的人们。正如许多西方国家与改革团体曾进行合作以结束贩卖奴隶一样,他们在下列问题上团结起来采取实际行动和给予道义上的声援,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如限制武力贸易,取缔白人奴隶制度,禁止酗酒,促进和平、保证公众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等。在全球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团体有世界邮政联盟、国际议会联盟、1899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国际戒酒委员会以及其它类似团体。全球展开的禁烟活动只是西方“探索有

① 希拉里·J. 贝蒂 (Hilary J. Beattie):《基督教教会与中国的鸦片 (1858—1895)》(Protestant Missions and Opium in China, 1858—1895),载《哈佛大学中国论文集》(Harvard University Papers on China),第22册(1969年5月)第112—125页;《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122页;大卫·E. 欧文 (David Edward Owen):《英国在中国与印度的鸦片政策》(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329—333页;乔舒亚·朗特里 (Joshua Rowntree):《帝国的毒品贸易》(The Imperial Drug Trade) (伦敦:梅休因有限公司,1905年)第242—252页。西方宣传禁烟的典型事例可见设在伦敦的禁止鸦片贸易协会,该会在1870年代即已存在。在美国,纽约市社会服务联盟主席乔赛亚·斯特朗提倡反对鸦片者联合起来。他劝说32个教会团体、30位大学校长和许多地方商会的首领在致威廉·麦金利总统的信上签名,要求总统让美国帮助中国结束鸦片贸易。见《中国之友》,第21号(1901年7月)第42—43页。

② 美国陆军部岛国事务局:《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Philippine Opium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以下简称“菲律宾报告”) (华盛顿特区:政府出版局,1905年);又见《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122页。

③ 《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122页;马士:《中朝制度考》,第370页。

组织的社会国际主义之路”的又一标志。^①

传教士对其同胞进行鸦片贸易的抨击有多种原因。显然，他们对鸦片及其生产者的谴责包含了道德因素。^②然而，这些“灵魂的拯救者”主张停止贩运和吸食鸦片也有很实际的动机。鸦片阻碍了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因为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鸦片与洋人有直接联系。洋人迫使中国购买鸦片，而传教士与经营鸦片的西方政府和商人是一丘之貉。这给传教带来相当大的困难。更糟糕的是，鸦片“使瘾君子对一切道德准则和呼吁十分冷淡，成为不能感悟的废物”。^③

其他反对鸦片者在道义谴责之上增加了经济的外衣。一位美国批评家在开头写道：“强迫中国输入鸦片对人类造成比非洲奴隶贸易更大的犯罪。”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经济贫困、道德沦丧、人民孱弱，阻碍中国进步。不仅如此，西方与中国的贸易需要后者内部的繁荣，因而鸦片贸易也抑制了真正的商业贸易。这样就形成了公平的赏罚：虽然鸦片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主要基石”，但英国同时又是鸦片贸易的最大受害者，因为正是它摧毁了看来是具

① 彼得·D. 洛斯(Peter D. Lowes)：《国际麻醉品控制的起源》(The Genesis of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日内瓦，1966年)第1—9页。

② 布鲁斯·D. 约翰逊(Bruce D. Johnson)：《正义先于税收：反对中印鸦片贸易中被遗忘的道德讨伐》(Righteousness Before Revenue: The Forgotten Moral Crusade Against the Indo-Chinese Opium Trade)，见《毒品问题杂志》(Journal of Drug Issues) 5 (1975年秋) 第304—319页；《字林星期周刊》，1906年7月13日，第116页；1906年9月7日，第72—73页；1906年9月28日，第787页。关于道义上谴责的详细记载，见凯瑟林·L. 洛德威克(Kathleen L. Lodwick)：《中国人、传教士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禁用鸦片的努力(1890—1916)》(Chinese, Missionary, and Intellectual Efforts to end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 1890—1916) (未刊博士论文，亚利桑那大学，1976年) 第36—102页。

③ 贝蒂：《基督教教会与中国的鸦片》，第107—108页；又见朗特里：《帝国的毒品贸易》，第188页；J. B. 布朗(Brown)：《鸦片政治：1874—1916年的禁止鸦片贸易协会》(Politics of the Poppy: The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 1874—1916)，载《当代历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8 (1973年7月) 第102页。

有无限商业潜力的市场。^①

1906年,英国议会11年来首次就中印鸦片贸易问题进行辩论,道德和经济问题无疑困扰着新当选的议员。1906年6月6日,随着自由党在大选中获得决定性胜利,下议院坚持谴责英国继续从事鸦片贸易。通过的议案声明:“本议会坚信中印鸦片贸易在道义上是不能维护的,因此要求清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使之迅速结束。”^②

这个议案的发起人特奥多·泰勒先生认为,虽然1858年的《天津条约》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它仍然是“非正义的”。泰勒批评1893年任命的鸦片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894年即被任命的一年之后就断定鸦片在社会中或道义上均非罪恶。他继续指出: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一直存有偏见,从印度政府的立场上说话,因此从鸦片生意中获得巨额收入。泰勒提到,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根本不研究中国的鸦片状况。10余年来,英国政府允许私利和金钱玷污人类尊严的基本原则。他问道:“这种罪恶酬金的捞取我们还要继续多久?”世界其它文明国家已经在国内及其殖民地取消了鸦片的合法地位。“我们还让它存在多久?”^③

泰勒先生提到的国家之一是美国。它在关于鸦片问题的菲律

① 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真正的中国问题》(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纽约:多德·米德公司,1900年)第149、284—285页。1906年初,英国自由党开始掌权,但长期以来,英国的对华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后果至今仍然存在。新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日益明显的是中国人的不良愿望使对华贸易之繁荣化为泡影。”外交部,371/35,1906年8月31日,格雷致朱尔典函。转引自利姆:《英国与印中鸦片贸易的终结》,第99页;又见布朗前引文。

② 英国议会:《英国议会议事录的议会辩论》(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下议院)第4辑,158(1906),第516页。

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的议会辩论》第492—499页。皇家鸦片委员会认为:“目前根本不能说英国政府把鸦片强加给中国。如果中国愿意放弃从鸦片获得的收入及因鸦片进口有害于中国而取消使之合法化的条款,那么中国就需要首先行动。”英国《皇家鸦片委员会》(7卷本,伦敦,1894—1895年)第6卷,第1部分,第52、95页。关于皇家委员会的批评,见朗特里:《帝国的毒品贸易》,第121—138、177—189页。

宾报告中给英国提供了参考意见，认为不论是主张政府继续鸦片贸易的人，还是力争结束鸦片贸易的人，出发点都是一样。^①中国的禁烟考虑也受这份美国文件的影响。^②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份报告，略述其中较为重要的内容。

菲律宾报告 1906年3月12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交了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由菲律宾委员会指派，该委员会在几个亚洲国家“调查那里的鸦片使用和贸易情况”。^③这份报告的来历是：马尼拉的牧师强烈反对当时菲律宾委员会提出的相当软弱的控制鸦片的法律。因此，菲律宾委员会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吸食鸦片的情况。1903年8月13日，调查委员会成员启程去香港，从而开始了这项调查。1904年1月15日，调查有了结果。5个月之后，即1904年6月，调查委员会将其在9个国家调查的鸦片贸易情况和建议提交菲律宾委员会。^④

鸦片调查委员会声明，他们的调查并非全面分析亚洲的毒品问题。时间仓促、语言不通及交通不便都限制了收集证据的数量。然而，根据与访问国的政府官员以及平民的谈话，根据这些国家有关鸦片的法律文件和直接观察，委员会试图提出一些看法，诸如：亚洲毒品形势的实质；那里是如何处理鸦片问题的；什么办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的议会辩论》(1906年)，第498、514页。

② 马士：《中朝制度考》，第486—491页。

③ 《菲律宾报告》调查的地点是日本、福摩萨、上海、香港、西贡、缅甸、爪哇、新加坡和菲律宾群岛。

④ 同上书，第3、11—18页。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是：调查委员会主席大爱德华·C.卡特(Major Edward C. Carter)(他是军医，又是菲律宾卫生委员会官员)；菲律宾教区主教布伦特(Charles H. Brent)(1909年上海禁烟会议主席)；马尼拉的乔斯·艾伯特(Jose Albert)博士和秘书卡尔·J.阿内尔(Carl J. Arnel)。又见肯顿·J.克莱默(Kenton J. Clymer)：《宗教与美帝国主义：1899—1913年卫理公会在菲律宾群岛》(Religion and American Imperialism, Methodist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899—1913)，载《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49号(1908年2月)第45—47页。